

贵族精神与自由主义理念的完美统一

——读《托克维尔回忆录》

许振洲

作者简介:许振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政编码:100871)

20年前,大部分国内学者还只能间接了解托克维尔的思想。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思想的现实意义也未得到充分承认。此后,托克维尔的两部主要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和《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先后译成中文,他的价值也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国内学界的普遍承认。最近,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董果良先生翻译的《托克维尔回忆录》,这无疑是托克维尔思想爱好者的一个喜讯。

写给自己看的《回忆录》

《托克维尔回忆录》的可贵之处在于可以使我们深入到托氏的内心世界,从而准确全面地把握他的思想体系及历史社会背景。托克维尔曾多次表示,他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取悦世人。“我是世上最不能违背自己的精神与趣味向上爬的人;当我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不到快乐时,我觉得我简直连个庸才都不如。”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认为他公开出版的著作还不像在《托克维尔回忆录》中那样直抒胸臆。因为它“只是为我一个人写的”,“是一面自我消遣地从中观看我的同时代人和我自己的镜子,而不是准备公之于众的画像。”即使是他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在撰写回忆录,因为他希望保持既不炫耀自己又不取悦他人的写作自由。托克维尔痛感大部分回忆录的作者都容易文过饰非,只展示自己光辉正确的一面,而他则希望能够如实披露自己及他人的行为与动机。我们看到,《回忆录》也确实是这种风格:既写出了他的内心活动,也栩栩如生地描画了活跃在法国1848年革命舞台上各角色的众生像。其文风的尖酸刻薄,与他公开出版的著作风格大异其趣:国王路易·菲力普“过分客气,但不择对象和有失尊严”,这种客气与其说是符合君主的身份,不如说是符合商人的身份。他绝不爱好艺术和文学,但热爱产业。……他本人没有信念,对他人的信念也不相信。”他的表姐在革命中只知哀叹自己的命运而丝毫不关心国事,因此是“一个

转引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导言第2页。

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6-27页。以下简称《回忆录》。
《回忆录》,第31页。

可能遇到的最善良的女人和最不好的公民。” 马拉斯特是一个喜欢奢华、吃喝、女人的，“总是用人民的自由来理解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制的人物。” 雷米萨“向来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现清醒，而对必将发生的事情表现糊涂”。 二月革命时的众议院议长索泽则是个笨蛋，“一个不知廉耻的大无赖”。 连他的挚友、因与他一起访美而闻名的博蒙，也不时受到他的调侃。在他的眼睛里，七月王朝的绝大多数政客都是这样一群缺乏远见、不通世务、心地狭隘、自高自大的二流人物。可悲的是，正是这样的人在领导着法国，并用他们的无能直接引发了二月革命。这种淋漓尽致的写法当然决定了回忆录是完全秘密的。但也只有如此，它才能真实。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托克维尔甚至在遗嘱中禁止在他同时代的人还在世时出版其《回忆录》。以这样的心态和风格写成的书，当然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真实思想，尽管它并不是一本专门系统的政治哲学著作。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是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师级人物。对于他的身份定位，人们经常看到的说法是：他虽然出身于穿袍贵族家庭，但却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或干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对于托克维尔来说，这二者之间丝毫不矛盾。贵族制并不妨碍自由，相反却可以成为自由的一种助力。“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在《回忆录》中，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真正贵族制的偏好和留恋。他认为，这是一个温和的、有荣誉感的、有以国家事务为己任的责任感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存在，无论是在旧制度下还是在 1814 年后的王朝中，都构成了公民政治自由的基础。相形之下，他对主导着七月王朝的资产阶级的批评倒是一点也不留情面，认为“一切政治权力、一切豁免好处、一切特权、政府的一切管理权，统统落在这个资产阶级的狭小的圈子里。……他们占据了所有的官职，使官职数大大增加，而且几乎全靠国库生活并把国库视为自己的产业。他们“受利己心的驱使，对政府进行私人企业式的管理；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把国事按照私事处理”。这是一个贪婪、低俗、没有远见的阶级，18 年来只是忙于榨取法国的财富。根据个人体会，他心目中虽然未必是黄金时代，但至少是小康阶段的法国，恰恰存在于复辟王朝、特别是 1824 年查理十世上台前的复辟王朝时期。“我年轻时期，在一个恢复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荣和伟大的社会环境里度过极为美好的岁月；我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关于中庸适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 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托克维尔鼓吹自由而将他强行解释为背叛了贵族阶级。他倒真是认为无论专制君主、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如贵族精神那样能够与自由自然结合。

看起来真正有些矛盾的，毋宁说是他在欣赏贵族精神的同时对民主制的认同。因为强调卓越的贵族制与注重平等的民主制确实不一样。他在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也正是对民主制下如何保护公民政治自由的论述。

《回忆录》，第 68 页。

《回忆录》，第 216 - 220 页。

《回忆录》，第 114 页。

《回忆录》，第 75 页。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34 页。

《回忆录》，第 29 - 30 页。

《回忆录》，第 97 页。

一般认为,托克维尔并不反对民主制。事实上,他赖以成名的著作正是那本《论美国的民主》。在其中,他准确地观察到,美国民主乃至整个民主制的本质特征是平等,即身份的平等。这“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他认为,西方几百年来政治、社会中的各种因素都在促进平等的产生。所以“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与其他政治制度相比,民主制有其特定的优点:它使政治权利的观念普及到了每个公民;它的立法更加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特别突出,而无知将大为减少;情感将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虽然还会有不良行为,但犯罪行为将大为减少。”然而他并不无条件地热爱民主制,他也同时指出了民主可能带来的危险:人民对平等的追求超过了对自由的追求。平等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似、相互隔绝、只醉心于自己的个人物质利益。这时个人自然而然地变得渺小和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旧制度下存在的贵族身份及特权虽然不平等,却可以成为中央权力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次级”权力,成为公民自由的有效屏障。民主革命铲除了这种不平等,但也同时撤掉了这层屏障,使分散软弱的个人直接暴露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的统治下。“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不会像民主国家的公民那样看来渺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像民主国家那样显得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民主性质并不能自动地保障自由。归根结底,政治自由只来源于国家的弱小,而非来源于国家本身。“如果你承认一个拥有无限权威的人可以滥用他的权力去反对他的对手,那你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多数也可以这样做呢?”对民主的国家权力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的限制,它也会变为“多数的暴政”。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人民最需要的,仍然是自由。

所以,托克维尔对民主的信念远不如对自由那样坚定。在这个问题上,最能反映他心理活动的是下面这段话:“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在《回忆录》中,他的这种情绪不断显示出来。

自由主义 vs 社会主义

在当代政治领域中,有许多容易引起人们普遍认同的概念,许多褒义词,如民主、平等、效率即发展速度、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有时人们无暇详察其中的深意,将那些可能是对立的观念理解为能够兼容。这里我们要举的例子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对概念。

从严格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自由主义者珍视权利,特别强调私有财产权是人权的核心部分;社会主义者则或多或少地坚持公有制。自由主义者要求弱化国家权力,严格将

《论美国的民主》,绪论第4页。

同上,第8页。

同上,第273页。

同上,第264页。

同上,绪论第11页。

同上,第573页。

《论美国的民主》,第288页。

《社会平等与政治自由》,转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文版序。

公共权力的运用限制在政治领域中；社会主义者则希望国家担负起自己的社会—经济职能。自由主义重视的是自由；社会主义重视的是平等。所以，作为贵族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可以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同民主制度，但却无法在《回忆录》中容忍社会主义思想。

法国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早在复辟王朝时期，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便已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影响。七月王朝时，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他们的阶级意识也有所提高。1831、1834年的两次里昂工人起义便是明证。路易·勃朗的国家工场设想、布朗基的武装密谋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尝试都在法国政治史上留下了痕迹。1840年蒲鲁东在其名著《什么是财产》中更是公开提出了“财产权就是盗窃”的命题，一时间成为了所有对社会不满者的口号。构成《回忆录》历史背景的1848年革命，特别是六月事件，相对于大革命来讲是一场新型革命：后者首先是政治的，前者则是社会的。后者的主力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第三等级，前者的队伍则已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对这次革命的新特点，托克维尔因了他的睿智博识，比绝大多数当时的政治家有更清醒的认识和预见。他看到，无论是二月革命还是六月事件，都“没有以改变政府的体制为目的，而是以变更社会的秩序为目的。实际上，它不是政治斗争，而是一场阶级的战斗，一种奴隶造反的战争，”是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面对当政者的麻木不仁，他早在1848年1月27日，便在众议院中大声疾呼：“大家没有看到他们的政治激情已经是社会性的了吗？你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正逐渐在他们的观点和思想中扩散，他们要推翻现行的统治、内阁和政府，而且要推翻社会，使社会今天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发生动摇吗？你们没有听到他们每天所说的一切吗？你们没有听到人们正在反复论证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和资格统治他们，他们的财富分配是现今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财产所有权是建立在最不公正的基础上的吗？”诸位先生，现在我把我深信不疑的事情告诉大家：我们正睡在活火山上。”

毫无疑问，托克维尔讨厌社会主义——不管是思想还是行动。他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是贪婪和嫉妒。他指出：“贪婪的欲望和错误的理论的结合，使这次动乱在发生之后变得如此可怕。有人叫这些穷人相信，富人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偷窃的产物。他们还叫穷人相信，财产的不平等既违反自然，又有悖于道德与社会。在贫困和激情的促使下，许多人相信了这些宣传。”他甚至为此隐隐约约地表示了对民主制的不满：正是民主思想在政治上对平等的强调，使人民产生了将平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冲动。当然，1848年9月12日在制宪会议的一次演讲中，托克维尔还是强调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区别：“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根本矛盾的认识，经常比时人更加清晰和深刻。

（下转第129页）

《回忆录》，第179页。

《回忆录》，第38页。

见《回忆录》，第211页。

《回忆录》，第180页。

《回忆录》，第109页。

转引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的企业却在不断地发展；最有前途的、长期以来处于“主人翁”地位的工人和农民成为社会转轨代价的主要承受者，处于社会的中下层和底层。所有这些都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中国还是搞社会主义吗？如果是的话，那到底应当如何认识传统理论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三个代表”其实就是从多个方面来回答、解释这个难题，也就是应对这种挑战。

第二，领导干部信仰上发生的危机与腐败问题实际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执政方式改变的副产品。它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早在1997年，时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就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遏制腐败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需要硬性约束，比如依靠民主和法制的力量，依靠党纪党规的力量等等；但与此同时，也需要软性约束，“三个代表”就属于这一种。换言之，“三个代表”的提出也是作为反腐倡廉和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因如此，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要紧密切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责任编辑：唐士其)

(上接第 118 页)

许多学者认为，托克维尔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但在我心目中，他的价值仍然在于其睿智而不在于其方法论。《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到处流露着思想的闪光，让人可以一读再读、每次都可以有新的启发的名著。但这里面的思想都是成品，而《托克维尔回忆录》则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理解他精彩的思想产生、发展、完善的过程，因此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唐士其)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28页。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